

孟乃昌 著

周易參同契考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周易参同契》考辨

孟乃昌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6 印张 9.875 字数 238,000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5325-1472-2

B·192 定价: 9.65 元

前 言

公元二世纪问世的《周易参同契》以其汉《易》学的意义、化学史外丹内容和道家养生术的实践和移置的理论，融凝为一个奇妙的统一体。自宋代开始，就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悟真篇》）、“万古丹经之祖”（《周易参同契发挥·阮序》）、“丹经鼻祖，诸真命脉”（《周易参同契幽幽·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详情见本文集之中。

我研究《周易参同契》，启蒙者是著名学者袁翰青教授。1954年，他在《化学通报》上几乎每期都发表一篇化学史论文。逐期阅看，爱不释手。我想学习、研究中国炼丹史以至中国科技史，选择从《参同契》开始，是适宜的。当时没有想到，这个课题的进行，竟然延续了三十五年之久。

我向我的祖父请教：应该怎样研究《周易参同契》？祖父指点从目录学入手，先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龙虎（上）经》和《周易参同契》的几条提要，然后选出重要注本（彭晓注、朱熹注、陈显微注、陈致虚注），阅读文、注。一九五七年冬写成我的第一篇研究（其实真正工作的时间不到半年），投寄《化学通报》，次年夏刊出。当时只觉写得很不理想，解决的问题不多，太平庸了。

于是，我在前辈学者工作基础上，1964年又写了《〈周易参同契〉的实验和理论》，1980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代表大会上提出，1983年发表。1982年秋，我又写成了《周易参同契》及前后关系的《中国炼丹术的成就》，分发给在成都召开的化学史学术

讨论会代表,听取意见。1983年春,扬州炼丹史小型学术会议就《周易参同契》的主要反应(或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说明《参同契》是治史者关心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

在较系统地阅读《道藏》的过程中,看到其中炼丹原著引《参同契》的句子就摘抄下来。日积月累,仅唐宋丹籍所引已逾百条。想看看这些摘句究竟有何作用,于是集中时间摘录,进度加快。按《契》文顺序排列的正文,与几种“道藏”及藏外注本的正文相互校勘。对照下来,《正统道藏》映字号托名阴长生《周易参同契注》和容字号无名氏《周易参同契注》的正文,与时代可确定为唐代的炼丹书所引正文相近或相同,而与彭晓本则差别较多。因而遍布全书的很多例句证实阴注本、容无本为唐代注本,当可无疑。前几年,陈国符教授以阴注本引唐《乙巳占》,以容无本注文引用诸地名只同时用于唐代的一段时间内,故定此二本为唐本。对此版本学的事情,我尚觉强调不够,证据似嫌薄弱,当时我就是这样述评陈老新著的。不料我的一百数十条材料得出同样结论,出于意想之外,但这是客观的,完全不是先“大胆假设”,后“小心求证”的方法。后来,又在两部时代为唐的炼丹著作中找到了对容字号无名氏本的注文的引用,唐人引唐人,结论更为确凿。这是关于版本系统流传上的一大收获(阴注本、容无本及其他有关注本,均避宋讳,如“坎离匡郭”缺笔,故知为宋刊《政和万寿道藏》的辗转复本或影本)。此时疑虑尽祛,于是执笔为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此前此后推崇彭晓本为现存最古之本、《参同》学为彭氏一家之学,由是而破。阴注本、容无本序言,本在彭前,与其他唐和唐以前史料均大体相合,过去的作者等问题的混乱只是由于彭晓影响极大的序言所造成的,好多不易解释的矛盾得到了说明。由此也理顺了作者们和时代的关系。一切材料找到了共同点,彭晓之说也自有他的位置。这项研究进行时就

很吃力，行文甚觉枯涩，情绪也不够高昂。但拙文分寄后，颇得师友过甚奖饰。

正值此时，接胡道静教授几次赐函，嘱为译注《周易参同契》。此系中国古代科技史译注丛书第一辑十五种原著中唯一的“化学”类一种书，规格要求较高。信任和鼓励，促使我提前进行了预定中的《周易参同契》专题系列研究，以便解决书中的许多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连同上述原作者等）不解决，就谈不到正确的全面的理解，何遑论译，且安下心来。

古今许多著名学者都曾涉足或致力于《参同》之学。东汉虞翻注《周易》、又注《周易参同契》（唐人有见者，引其注文），但两书今均散佚。“辅嗣《易》行无汉学”，王弼注通行。宋朝朱熹（他给《契》下了“词韵皆古，奥雅难通”的八字批语），和明代杨慎、徐渭、胡应麟，清代黄宗羲、姚际恒、胡渭、惠棟、张惠言、段玉裁、桂馥、王筠、徐灏、杜昌彝，以及近人胡适、马叙伦、余嘉锡等都作了很好的工作，推动了《参同》学的前进。他们各具不同的才、学、识，足以解决基本问题，但都没有能统观综览全书，并放在当时时代大背景上理解。有的仅从目录学着眼。有的则作为其他研究的附属，或者只是片段的札记，沾一沾又离开了。可能由于他们对内外丹不熟悉或不够熟悉，或不能兼备二丹渊源知识（哪怕是古典意义的），《周易参同契》大问题尚待解决。

《周易参同契》历代注家，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钩玄发微，踵事增华。注者数十家，学术水平参差，知识结构不同。有信仰框架所加的限制，又有流派门户。但他们的共同优点之一，是有道家养生实践基础，于丹法功理各有所发明，有的见解甚为精辟。《周易参同契》毕竟是早期古典著作，养生功法功理一千多年间有很大发展。外丹术只存两个唐代注本，其余《藏》内外注本均为内丹注本，只彭晓是双兼，有点例外。所以历代注本反映了

各该时代功法水平，是一定程度的再创作，也是一笔可贵的财富；当然这里有曲解不通，故弄玄虚，甚至精华与糟粕并存，是应予剔除的。愈往后来，注释愈清楚，这个注者群体大体读懂了全书，尽管那都是以内丹视角来看的。应当公正地说，《周易参同契》如此规模地流传到今天，有多种版本，翻刻本无数，影响之大，主要是由于宋、金、元、明、清历代道家养生术相对广为流传的结果。发挥作用的主要在于这个系列的著作。

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鲁强、戴维斯、曹元宇、黄素封、荣格、袁翰青、张子高、李俊甫、李约瑟、何丙郁、席文、吉田光邦，他们都是把《周易参同契》当作化学史料书来研究的，由其中取有化学意义者加以解释。荣格据吴鲁强译作作独特的精神分析，别具一格，也关化学。

我也是由第三条研究之路走过来的。现在要我译注全书，就要涉及整个领域。科学责任感使我不能草率从事。对这部特殊的书的译注，由于前人工作虽多但不透彻，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自己作研究，当作译注的依据和基础。也就是要从整体上、从细节上都自己真懂了，或接近懂了，才可以执笔。有些还可以儿说并存。整体的基本问题首当其冲，高标准的译注任务督促我去尝试它，看看能否拿下来，哪怕只得到阶段性成果。

在1958年发表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参同契》文章中，逐一分析了进一步研究的三点困难（原文晦涩或有遗漏；药物隐名有待确切破译；作者为谁、为几人、作品是否伪作）以后，作为全文结束的段落写道：“尽管我们在研究《周易参同契》时还有困难，但这些困难和以前《周易参同契》注解者的困难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知识，完全能够解决这些疑难。有勇气揭露困难问题的症结所在，正意味着充满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解决疑难的时机近乎成熟了。《《周易参同契》通考》的完成，冲开了一个突破口，局面相对豁然开朗了。好像登泰山，好不容易上了中天门，虽然到碧霞祠和玉皇顶还很艰巨，但马上有一段“快活三里”，正宜鼓勇气，登险峰，览奇观，师造化，不负此行。于是接着搞《通解》、《通释》。从今古文经学的斗争看《周易参同契》现存原文的历历年轮及其刻痕人（作者们），那时间刻度原来是这般细致得难着寸分。以往大家都不同意的纬书与伪书揉合为今本，却也有合理内核，对许多不正确的意见为什么不正确，大都了解释。几乎没有一条史料不能被运用，不能被说明的，恰恰如同这些“精灵们”反戈一击，反转过来加强了论证。令人费解的孤立事实联成了一片。这主要是时代大背景，学术大背景和严格的历史观念所给予的。《参同契》本来是作为外丹化学（加内功直述）而后为道家内丹移植的（唐以前史料全是外丹运用，唐代交错，后渐转内丹阐释，见拙文所引史料），我从化学史入手，是从上游源头搞起的，自有应具的位能，显然比从“流”入手事半功倍。所以，到《通释》就顺畅多了。把成书至唐这一期间内外丹家与今之治史者均认为“空白段”的，以点式法虚虚地联成了线。分出了汉易纬候部分（作为火候的比喻等），建立了全书的外丹化学体系和内丹养生体系。通过三个层次的内外丹结合论证，从比较学方法上说明了东西方炼丹术的同源，而非多源平行发展。

在草拟《通解》、《通释》时，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清华攻读断学科学位，对科学、哲学很感兴趣，一个当时还在太原工业大学读化学本科，我把疑似之间的问题提出来和他们讨论，听到了不少新奇的见解，在文章中曾署过他们的名字。

以上三“道”虽不敢称它们为“阳春白雪”，但毕竟是试图透彻解决问题而写的。所以应列出另一部分，把前此纂著相关的文章集结起来，成为《周易参同契》研究资料，供阅读者、研究者

查考。1958年那篇，可以当作刚刚接触《周易参同契》的读者们阅读用的，其中也包含后来研究的纲要，观点至今也没有本质的改变。第五篇是第四篇一个问题的阐发，即把《参同契》的最主要化学过程说清楚。第六篇以《参同契》为主体，论中国炼丹术的外丹初期理论和内丹全过程理论为铅汞论，而中期外丹由于硫化汞合成建设成为硫汞论；西传的是后者，并带有后者的影子。第七篇中国炼丹术还丹的演变，由《参同契》作品一直影响到近代化学革命，是把李约瑟、何丙郁、席文、莱斯特研究的中外几个“点”，恰恰接上了《参同契》的“源”，联成了一条长线。最后一篇，说历代中国炼丹术内外丹结合和离异的种种情况，最后仍归于中西方内外丹房的比较研究，目的在于给中国炼丹术西传提供实验材料。中西交流，篇篇写一点，积累多了，便于作普遍性结论。这些文章把魏伯阳当作主要作者，现在看来他仍是今本作者之一，以前的提法也无须改变，况且当时就有一定保留。……文章出来了，不可能点点皆受到赞同，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对于错的要迅速纠正，有理有据的要“疑义相与析”。

先祖父瑞瞻公，对我的学习指导，非仅有关《周易参同契》一端。谨恭以此书，拜献给慈爱的祖父。

我的《周易参同契》的研究过程，到今天已历时三十三年以上，指导我、帮助我的人太多了，我应该表示诚挚的谢意（有的图书馆工作者，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科委袁翰青教授全面开拓了中国化学史研究领域，是我的化学史的研究引路人，拜识后，袁老经常赐函指导和鼓励，在我老指导不，共同执笔写出过徐寿研究的论文。清华大学前副校长张百生教授，把《周易参同契》的种种学术观点整理讨论，平等待人，他的学术专著《中国化学史（古代之部）》即将完成时，承袁老邀请参加讨论，对当时未二十四

五岁的我，实在是过份看重了。几年以后，书出版了，又以小楷亲笔题赠，词极谦雅恳切。那时张老年事已高，每每委托杨根教授（五十年代初张老的研究生和六十年代的助手）和我联系，通信多次。曹元宇教授，我所敬佩的多才多艺学者之一，论著见解精辟，诲人不倦，多次向我提供研究文献资料；在扬州炼丹术小型学术会议辩论《周易参同契》主要内容时，曹老说：“不要以为我们说过的，都是对的。”语言平易而虚怀若谷。陈国符教授，以《道藏》研究而名闻宇内，也多次为我提供研究资料，赠所著论文抽印本，亲笔改正再改正。我的《周易参同契》研究和其他炼丹史研究，多以陈老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明教授，多次来信鼓励、奖饰，并赠所著《道家道教思想研究》论文集，每篇都使我获益良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奎克教授，在治学方法上常给以启发、指导，多次与我竟日讨论，把学术观点萌芽向我介绍，嘱以成文。本来王老与我有约，待暇时在他的指导下合作研究《周易参同契》，但到我要写作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时，和王老联系，他正忙于整理学术价值很高的《干支考》，不及他顾了。四川师范学院李耀仙教授，拜识不久，在1987年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期间，住在隔壁套，就便求教清益，往往作长夜不倦之谈，得益很大。关于经学今古文派之争，童年时代就听长辈讲过，从未致用已颇有朦胧之感，经李老点拨顿感明悟，不久在写作《〈周易参同契〉通解》时，果然就用上了。以上前辈学者，我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北京大学化学系赵匡华教授，还有郭正谊研究员，我们同搞炼丹史研究，选题密集度很大，但彼此相处很好。炼丹史模拟实验作为实验科学史研究方法的新趋向之一，我们又在1982年春天同时起步。我对他的研究成果极表钦佩。他对我帮助很大，提供文献资料多种，包括手抄资料。任何两个人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学

术见解，我们于《周易参同契》和其他问题每每激烈争论以求真知，争论而达到统一，彼此都觉得提高很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争论是友谊的。我对匡华兄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胡道静教授，我已拜识多年，经常得到他的当面及赐函指导，多次赐赠著作，以他的治学严谨、论证精到而感染我，胡老以《周易参同契》译注予我数次不允推却，表现了对我的信任和看重。李剑雄先生，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也多次函件往返商讨指点，促进了本书的结集和质量的提高。特别是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教授，极为关切中国科技史和《周易参同契》的研究，每次寄有关的文章给他，都及时回信指导。有时钱老在几天之内又复来函，谈对拙文的意见，如要分清内外丹的含意，道家内外丹名词统一而儒释不用外丹名词等论断，实际上都起到了提示研究课题的作用。谨向以上学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宋健玲、黄建东、赵晋梅、阎念斌同志帮我抄稿，也应致以谢意。

最后，我静待海内外学者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孟乃昌

1990年2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周易参同契》通考.....	1
(一) 炼丹原著引文	5
(二) 最古的注本和正文	26
(三) 本书与谶纬之学	30
(四) 时代特征的诸多显示	35
(五) 作者之谜	38
(六) 内证：文体与内容的矛盾	43
(七) 佚文辨伪	49
(八) 徐、淳于、魏氏与《神仙传》	52
(九) 关于彭晓之序、注	56
(十) 所谓“古本”	59
(十一) 以“三”解题	62
二、《周易参同契》通解.....	68
(一) 书中出现的人物	70
(二) 今古文经学派斗争的背景	72
(三) 几种最古的炼丹著作	75
(四) 从人物评价看作者们	77
(五) 作者们所属的炼丹流派	80
(六) 九鼎丹经第一鼎及其他	83
(七) 由朱熹划《契》所定的《易纬》	85

(八) 《参同契》如何成书	92
(九) 再释“参”、“三”	97
三、《周易参同契》通释	101
(一) 唐以前论《参同契》	103
(二) 唐代及以后的发挥与注释	108
(三) 现代中外研究述评	117
(四) 从阐释学观点看纬候问题	121
(五) 原始化学体系	129
(六) 道家内功体系	134
(七) 下卷总论和提出的问题	138
(八) 内外丹结合三个层次的依据	141
(九) 内丹移植外丹理论的年代	147
(十) 对西方炼丹术的影响	152
☆ ☆ ☆	
四、《周易参同契》及其中的化学知识	160
(一) 炼丹理论以及定性和定量的概念	162
(二) 实验设备和技术	164
(三) 无机化学知识	165
(四) 有关化学工艺知识及其他	168
(五) 结语	173
五、《周易参同契》的实验和理论	175
(一) 一节详尽的操作	176
(二) 升华器叙略	186
(三) 炼丹理论	188
(四) 有没有合成硫化汞	193
六、中国炼丹术的基本理论是铅汞论	205
(一) 《周易参同契》与铅汞论	207

(二) 其他炼丹原著与铅汞论	214
(三) 《参同契》注家均以“黄芽”为铅或含铅物质	218
七、中国炼丹术“还丹”的演变	225
(一) “还丹”与铅汞	227
(二) 各种丹方与铅汞	232
(三) 铅汞论的分化	234
(四) 主铅与主汞之争	237
(五) 主铅论的记录	239
(六) 主汞论的“七返丹砂”	244
(七) 在阿拉伯的反映	248
(八) 配料份量和加热时间	250
(九) 仪器和返还思路	253
八、论中国炼丹术内外丹之联系	262
(一) 中国炼丹术内外丹的联系与发展的 三个时期	263
(二) 三个时期的分述	267
1. 第一期	267
内外丹并举和分列	267
2. 第二期	271
甲、内外丹结合	271
乙、内丹返说外丹	275
丙、丹经归属	279
丁、北宗与内外丹	282
戊、南宗与内外丹	285
3. 第三期	290
甲、理论向简约复归	290
乙、清代仍在结合	293
(三) 与外国炼丹术比较	295

一、《周易参同契》通考

摘 要

《周易参同契》有关研究历代至今未能透彻。不先确切考得其作者与时代，无论如何注解《参同契》，绝难真正了解其内容。本文从正统《道藏》所收唐宋炼丹原著二十六种，摘出《周易参同契》引句一百五十七条，归纳为六十一例，对勘今本。以此为基础，较为可靠地弄清了前人未曾解决的若干基本问题。四、五、三言句和楚辞体文字，彼此见解各有不同，故非一人一时之作。彭晓《通真义·序》和《四库全书总目》所主张的意见，虽似成定论，实为混淆之源。破彭说以后，豁然开朗，以校勘证得《道藏》阴长生注本和容字号无名氏注本为唐代注本。参以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文献资料，得出徐从事、淳于叔通、魏伯阳依序或为作者，或为传注者。书中度辞所隐四言句作者魏伯阳的籍贯和活动年代，是被彭晓等由桓帝时人淳于叔通的情况中移植过来的。书中四、五言句最为重要。五言句时载在前，有正文之意，为外丹术叙述，和内功术直述，四言句时代在后，出

于魏伯阳，已经有限度地“托号诸石”或作内丹解释。魏伯阳的真正活动年代约在东汉末年，与另一著名炼丹家狐刚子为同时代人；较“公认”魏伯阳的鼎盛年（公元140年左右）约晚40—50年。魏的籍贯的说法共四种，确定应为今河南郑州南部一带，这对了解东汉炼丹术的流传分布是重要的。四、五言句依托纬候，是成书于东汉的时代特征；以《周易》与黄、老并列，正是两汉黄老之学向东汉至魏晋的老、易和老、庄哲学过渡的时代特征。今本正文，大体唐代已定型如此，内容虽略有错简，但不出于后世伪托。本文以校勘学与原文内证实例解决问题，摒弃俞琰、杨慎等“仙传”、“精思”、“挖地得石画”等实为推测性说法，因此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道家典籍《周易参同契》为历代学者所重视，于其作者、年代、流传、辨伪、文字、版本，颇多考证。众说纷纭，然皆泛论，远不透彻。现行说法，取若干公认之言，不应视为定论。本文作者披览《道藏》唐宋炼丹书，查出其中原著二十六种摘引《参同契》，文字与今本各注本正文逐段勘比，结论一新。始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参同契》数种注本之论断要点颇多误说。历代诸论，容有差失。而由此出发亦可得出关于作者及时代等重要结论。这是一般推测所未达到的。

明确的时代意识，使讨论可以更为深入。为此，先确定所引用的26种原著的问世年代，取前人说，择善而从，间附己见。《道藏》经籍，时代确定，颇有难度，此非专考，取用而已。异日当对此重要问题之原则、方法、应用实例等，另撰篇章以叙之。

1. 《石药尔雅》，梅彪撰，唐元和元年（806年）著成。
2. 《真元妙道要略》，原题郑思远撰。按，思远，公元三世纪

人，葛洪之师，与内容不相应。李约瑟认为由八至九世纪^[1]。笔者据内证（关于李勣本草注、张果龙虎丹及吴筠《玄纲论》等）定为八世纪^[2]。

3. 《丹论诀旨心鉴（照）》，张玄德撰。李约瑟定为约九世纪^[3]。据内证“余嵩山曾见司马希夷（承祯，647—735年）修大丹，喜乃问访之。火（丁）巳（717年）五月，余问之，伊又秘”，笔者以为出八世纪前叶。

4. 《张真人金石灵砂论》，张隐居撰。李约瑟定为713—741年著^[4]。陈国符由《新唐书·艺文志》订为代、德宗间（763—804年）所出^[5]。据内证“余自开元间（713—741年）二十余年专心金鼎，颇悟幽微”，笔者订为734—770年撰成。

5. 《还丹肘后诀》，托名葛洪。李约瑟定为875年^[6]。按文末“唐仲达灵真人记”序，有“乾符乙未岁丙子月记”，故确。

6. 《通幽诀》，作者不詳。内证：“阳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犬戎以火镜感艾化之，须臾则火出，像还丹阴阳金火。大唐国内，时亦有之，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出于唐代。李约瑟定为不早于唐^[7]，亦是。

7. 《龙虎还丹诀》，金陵子撰。李约瑟定为五代、宋或更晚^[8]。陈国符据书中地名订为垂拱二年至开元末（686—741年）^[9]。笔者按全书内容与唐代陈少微、张果著作相同或平行，故应联陈说。

8. 《还金还》，陶植撰。李约瑟定为约九世纪^[10]。笔者据该书为《还丹肘后诀》所引用，故订为九世纪初、中叶。

9. 《阴阳九转成紫金点化还丹诀》，李约瑟云年代未知^[11]，陈国符据书中地名定为唐代^[12]。联陈说。

10. 《太上卫灵神化九转丹砂诀》，李约瑟定为宋或稍早^[13]，陈同上定为唐^[14]，可信。

11. 《日月玄枢论》，唐刘知古撰，引自《道枢》卷二十六。